

流放的政权与流亡的身体

——论五零年代公领域中的主体、物、与性 / 别

赵彦宁

壹·前言

自八零年代末期始，对「流亡」(exile, diaspora) 情境及其认同形成的探讨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中逐渐受到广大的注意。流亡者——不论肇因政治、全球殖民化之经济力流动、抑或个人之自我流放——以自身之身体不断跨越既存的国族、物理空间、文化、阶级、性别等种种认同之区隔，因而也同时重新划分这些区隔，并进而建构新的区隔形成的可能。就政治流亡的情境而言，人类学家 Malkki (1995) 对中非 Hutu 族因与 Tutsi 族之种族战争失败因而被迫流亡坦桑尼亚的国 / 族认同研究，便挑战了传统人类学及文化研究对国 / 族认同之既定看法 (亦见，如 Alho 1987; Appadurai 1991; Balibar & Wallerstein 1991; Bhabha 1990; Clifford 1988; Gilroy 1991; Malkki 1992)，且重新审视「文化」的观念，认为个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仅是多元的、且是多变的。

在所谓「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或「汉人研究」的领域中，类似主题之研究则仍处新兴的阶段。大部分既存之学术著作多着墨于中国现代化早期之文学作品 (见，如 Chow 1995)，对于五零年代国民政府流亡台湾初期之情境，或许基于数十年来多种不断变迁之政治因素之考量，举凡公领域之建立、国 / 族认同之重新塑造、

族群互动之理解等等议题之探讨则几乎付之阙如。于本文中，作者将借由分析当时公领域中之部份与主体认同有关之论述，包括回忆录、报刊随笔、文学作品、及政府公告，试图探究于这个特殊的流亡情境中象征秩序之建构与流亡政权及个人主体性再现的形成机制。

贰·人与物的关系

1949年夏，渡海来台之初，于「客心孤寂」（琦君 1980：209）之中，琦君写了其于台湾的第一篇散文〈金盒子〉，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自此展开其于五零年代台湾这个「音尘阻绝」（同上，页43）的时空脉络中的文学生涯。于文中，作者一开始便暗示，流放的政权所栖止的空间本质虚空、无能与流亡者产生象征互动、因而亦无法生产流亡者其主体意义性的指涉系统（referential systems）；于如此的状况之下，流亡的身体必须依附于一适当之物（object），借由主体—物之互相创构关系（object relations）方可于此虚空之时空之中存活。她说：

几年来，我一直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却从不曾忘记把我顶宝爱的一只金盒子收藏在箱中的最安全处，每到一处，就得取它出来，摩挲把玩，以慰客中孤寂的心情。（同上，页7；底线为本文作者所加）

在虚空的流亡时空中，外在物理空间的定点不再具有任何指标性（index）的符号意义，唯一的意义辨识（intelligibility）来源，在「每到一处」必要将凝聚过去回忆之物取出，再次建立身体与此物之感官关系（「取它出来，摩挲把玩」）。在琦君的例子中，这物为盛有其幼年时与兄长共同摩挲把玩过的烂泥小兵，象征着的是二娘入门前完满的亲属关系。虽然此物为勾联有意义之过去与无从辨识意义之今日的唯一桥梁，其所体现（embody）的记忆却是必然性地扭曲的。她接下来说：

(中略) 自思年来饱经忧患，一颗苦涩的心，实不复有闲适的情趣，追忆欢欣的往事了。所以每当捧着这些玩物时，心头就充溢了难言的凄怆，可是正因如此，我才愈加爱惜它们，这实在是无奈何中的一点慰藉。(同上，页 7-8)

金盒子所能引发的不再是记忆原点的欢愉情绪。虽然记忆主体清楚地记得这情绪的形式，但在流亡的虚空时空中，她已失去了再生产这形式的力量。在主体与物的互相创构关系中，真正可被生产的意义为与「原始文本」(original text) 相较而生的差异性意义——虽然在琦君等流亡者的情境中可清楚地发现所谓的「原始文本」其实早已不(甚且可能未曾真正)存在，其理论上的本始性究其本质，仅能以主体模拟性地复制方式于现存的时空中存有。这意义的复制形成本源有如 Levinas (1989[1966]: 152) 于分析 Blanchot <等待着·遗忘着> (“Waiting Forgetting”) 一文中所揭露的因应于**彷彿 / 模拟 / 复制**相同之最终能指文本，因而产生的必要性意义差异：

「他沿着她的身旁，开始听觉她的话语，但同时似又立于这语声的后头……这是另一种语言系统，此系统与她的语言毫无共通性」。Blanchot 这里指出的简直是，人借由相同性的存有而成为可被复制的双重 (“through being identical, became double”)；彷彿不论意识是如何的自由，它仍遂行了本身所未曾拥有过的一项功能。

Levinas 于此所欲昭显的为一本体上 (ontologically) 自外于象征秩序、但又同时为此象征秩序之生产来源——但绝非指涉性元始——的「冷淡的中性语言」，由于与象征秩序这个日常生活中「真实性」的创构基础无涉，这个冷淡的中性语言亦与以言说行动为机制而被理解及遂行之认同形成无关。「真正的意义」无从自依附于能指系统而生，而是须借由感官性的、近乎转喻性的、但本质迹近冷淡的亲近关系而来（「他沿着她的身旁，开始听觉她话语，但同时似又立于这语声的后头」）。透过这个过程所产生的，并非源自能指差异性的主体性，而是他所谓的「可被复制的双重」；如果可被复制，在象征秩序中便涉及「原始文本」及「复制品」主从、

时间先后、抑或逻辑因果之间的意义及价值上的差异性关系，但在 Levinas 所着墨的意义生产过程中，这差异性之源头却正是「相同性的存有」。在 Levinas 一文中，这相同 / 双重的存有与意义为透过感官性之身体与感官性之语声同时互相依偎、但又互为远近之转喻性关系所形成的；在前引琦君一文中，则借由不断摩挲之双手及金盒子之间的感官关系所建立。金盒子于此并非传统精神分析学派所理解的恋物(fetish)，因为恋物之创构仍必然涉及以象征秩序为操作机制之隐喻、转喻、及主体认同之互动关系（见，如 Freud 1963[1929]；赵彦宁 1998），但本文作者认为，琦君及其它多位当时之中国流亡者所经历的，却正是一国家及主体认同唯有借由模拟性之复制关系方可差强人意地为个人主体所理解之情境。现世之时空情境于不断流亡的状态中变得本质空无，因此象征秩序作为真实之指涉原则的能力（Bergson 1988；Deleuze 1989）亦复消亡，最后仅存可能意义之来源便是个人感官性之身体、以及与其产生模拟复制认同关系的理论上之意义能指载负者（金盒子）。更重要的是，这个同时模拟性地复制象征秩序及无从认同的主体的平行过程，涉及一特殊之时空性，如同 Bergson 所提出的「duration」之观念，这是一本质混沌、无限延宕、无从区分及辨识的感官性时空团块，其对象形成与主体认同的关系如同 Blanchot（见，如 Liberton 1982）所说的「之外」（outside），主体对其的理解仅能以「等待着·遗忘着」（waiting, forgetting）这个似乎本质矛盾的时空感受稍堪比拟。本文作者认为，对五零年代许多中国流亡者而言，其所经验的虚空时空正是此种无限「等待着·遗忘着」的 duration。

较琦君的例子更为极端，牵连孙立人案于 1950 年入狱的黄美之经历的是暴力性的与记忆这指涉系统完全脱离的情境：

〔于狱中〕我极力用思惟来证实我生命的存在，只是我的思索系不到过去的欢乐，也搭不上未来的希望。大概总是痴痴呆呆的吧，看守警觉的常从门上小窗探视我，轻轻的喊「小黄，小黄」，我若不答应，门就会吧哒一声被打开，见我仍乖乖的坐在角落里，便笑笑说：「也答应一声嘛，让人放心。」

砰的一声，门又关了。哎，为什么不放心呢？我又不会自杀，虽然夜间，每当我躺下去睡觉时，真正希望第二天不再醒来，但每天清晨，我都被其他号子的人拿着脸盆拖着木板鞋的磕碰声吵醒，朦朦胧胧的总是想不起自己到底在何处？这样的日复一日。（黄美之 1998：25；底线为本文作者所加）

不仅因政治冤狱为一意义全掌握于一脉络无从索解的异己手中之境况，更因监狱本身由 Van Gennep (1960) 以降之象征文化人类学家的角度来看，等同一如同 Turner (1967) 所谓之既存社会结构中必要性的中介状态 (liminal stage)，故而社会时空冻结，一般社会情境中基筑于言说行动之上而产生之主体性亦不复存在（因此，监狱看守对黄美之的唤名 / 意识形态召唤 [ideological interpellation; Althusser 1971] 完全无法形成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预想之效果），因此记忆不在（不论主体如何尽力于辩证思惟「我的思索系不到过去的欢乐，也搭不上未来的希望」），而且物理性时间亦失去连续感官性身体、对当下之记忆、及个人空间所在参考位置之重要性——尽管所谓客观性的直线性历史时间仍不断流动着（「朦朦胧胧的总是想不起自己到底在何处？这样的日复一日」）。于如此象征冻结的死亡情境中¹，黄美之肉体生命之延续附着于一偶然出现之物：

有一天，我仍是静静的坐在那角落里，门开了，孙若愚笑笑的站在门口，孙若愚是看守所的副所长，但很少来到监所内，抗战时，因制炸弹要炸日本人汉奸走狗，有次不小心，把他自己手腕炸断了，就这样缺只手腕的拥着一团和气的微笑，右手拿着一样红艳艳的东西，他说：「小黄这个给你玩。」他把那红色的东西交给看门的看守，看守按规则打开那红色盖，看看里面什么也没有，就交给了我，我接过来看，原来是一只塑胶的红色番茄盒，盖子上面还描绘了一片有金缘的

¹ 对 Douglas 等象征人类学家而言，通过仪式中的中介状态正如同死亡——一般所理解之死亡不仅为肉体之消亡，也是个人于既存社会结构中主体位置的去除；在诸如入狱等强制性的通过仪式中，消亡的则为个人于后者中的言说位置，即象征层面上的死亡。

翠绿叶，我突然感到生命的光艳，像小孩得到了新玩具，嘴中不断的发出啊啊声，两手忙着把盒子盖开了又盖，盖了又开，想到要说谢谢时，门已关了，人也走了，但我麻木已久的快乐感，竟霍然苏醒，就这样快乐了好几日。（同上，页26；底线为本文作者所加）

与琦君的金盒子不同，黄美之的红色塑胶番茄盒并不负载任何对于过去抑或时空、抑或亲属关系之记忆——虽然如同前者，黄美之勉强可由模拟复制得来的身分认同（「政治犯」）须借由与此物间的感官转喻关系方能差强确立；但其对于主体认同之建立，如同琦君，均沿于仿同一源本空无之认同。如此虚幻性的认同只能存有关于与象征秩序无涉之境中（如监狱），但在象征秩序强硬介入之时（于此为当其透过看守确定其法定入狱时间为十年时），黄美之唯一能做以维持其生命存续之事，便是将其肉体性之存有完全依附于红色塑胶番茄盒之上——也正因如此，这个塑胶盒才被黄美之于此文标题中称为「我的红色塑胶番茄盒」：

时间与空间的巨大差距，如猛雷急电向我头上劈来，我失去了平衡，昏晕如坠入井底，我尽力的紧靠着墙，两手紧捏着番茄盒，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自救，要扩大我自己的空间。（同上，页30）

这里所谓时间与空间的巨大差异，指的应为主体依援其原先基于创构自我意义及人生经验而无从了解、甚而无法想像的十年中介状态与当下肉体无时无刻不被迫体受——但其实无从产生意义性——的监禁空间之间的冲突。有趣的是，在这「十年」的意识形态暴力式的召唤黄美之之前，她除了借由红色塑胶番茄盒便完全无法建立此刻、过去、及未来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其主体性仅以浮动模糊的方式隐隐展现；但于被召唤的此刻，其主体——于此清楚的以第一人称代名词「我」的形态重复性地被宣告着——却不得不借由与物理空间之转喻关系肉体性的显现出来（「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自救，要扩大我自己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引发这个主体形成过程之始为前述「时间与空间的巨大差异」，且此差正是以

肉体之形式撞击原先无感的主体。也就是说，在黄美之的例子中，这个突然以物理形式攻击个人的差异性，正如同稍早分析过的红色塑胶盒，对主体创构之功能便在其模拟逼近的转喻性。因此，自象征形成的角度来看，我们简直可以激进地假设白色恐怖时代的国民政府竟以政治冤狱的形式创构无依之流亡主体一种象征形成的可能性。

在流亡时空不具象征指涉意义之情况下，自五零年代至七零年代末，台湾的公领域的再现系统中除了前述挣扎于模拟认同的自述性文字之外，更普遍的便是完全否认（repudiate）、抑或「遗忘」现存物理时空而转为复制过去认同的所谓「怀乡」文学。譬如，以《旋风》（1957[1952]）及《重阳》（1961）等「反共文学」著称、并获得 1978 年第一届吴三连文艺奖的姜贵，于来台定居于台南十四年之后，应《台湾新闻报》副刊主编之邀，以「家在台南」为题的一篇自述性短文中，虽于文首称：

人生如寄，踪迹无凭。我在我的故乡的出生地，仅仅住到十二岁半便离开，从此东飘西泊，居止靡定。上海算是我「成家立业」的地方，一直认为它是我的第二故乡，但先后也不过居留十年。而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台南，却已经住满十四年，看样子还要住下去，这你就可以想见我与其的关系之深了。（姜贵 1974[1962]: 109；底线为本文作者所加）

但于自我标定写作主体与台南这个「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居留之地于现世物理时空的深切关系之后未久，姜贵却又自承无从以文字这个再象征系统再现「家在台南」：

但现在要具体而微的写一点台南生活的情趣了，我却又临纸踌躇，不知道从哪里下笔的好。而睽违四十年的故乡风物，只顾不时地挨上前来，有似鬼影幢幢，颇欲借尸还魂。（同上，页 110；底线为本文作者所加）

「临纸踌躇，不知道从哪里下笔的好」对当时的中国流亡文人而言是一种颇普遍的经验。譬如，流亡文人焦一枝在 1950 年 8 月副刊

未久²的《自立晚报》新开的专栏「我在台北」的发刊词中便说：

我来台湾，快要半年。半年来，没有动过笔。当然，不是没「笔」，而是心情不再，写不出什么东西。有时候，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一提起笔，又无话可说了。人到中年，顾虑太多。黄色的东西不屑写，八股滥调又写厌了。讽刺的东西，深恐得罪人，因了时局或者气候关系，许多人很敏感，偶尔看到几句，就疑心在讥讽他骂他，所以不敢写。至于牢骚固然很多，然而在这年头，发牢骚于事无补。（焦一枝 1950）

于此，焦一枝清楚地说明书写文字这个再现系统、其生产/复制工具、及象征/书写主体之间不必然性的连结关系。写作者固然拥有再现之生产工具，但因「心情不再」——即形塑其再现主体的物质基础迹近沦丧——故而「写不出什么东西」。而此处具危机性的物质基础指的便是多变、无从辨识的「气候/时局」。在最后标题为〈台南·潍水·巴山〉的短文中，姜贵接下来叙述的完全为其「借尸还魂」、其身体已四十年未再亲临的「故乡/家」四川。尽管于文末他对这个时空跳跃的「家」的解释为：

从台南到巴山，在地理上，是一个遥远的距离。但就我的感情而言，则是差不多的。一个是我的故乡，一个是我的又一故乡。在我的记忆中，它们要互争短长，挤来挤去，那就难怪了。（同上，页 112-113）

但「台南」于其回忆叙事的符码链索上，如同姜贵自己精辟的比喻，仅是作为一个可被「真正的经验」——即其实已消失四十年的对「故乡/家」的回忆——暂居/借用其外表的形式而「还魂」、但本质空洞的转喻性符号罢了。若此象征操作可以有效力的运行，其背后所预设的象征原则便应该是：第一，如同稍早琦君的例子，被主体认为唯一的真实不但必然存在于物理空间大异的过去，更重要的是必然性的存在与个人亲属系统结合最紧密的那段时间，因此，

² 1949年因「国势危急」之故，除了《中央日报》这个国民党的机关报，大部分的民营报纸均暂时停刊。

对琦君而言，金盒子象征的是二娘未进门前（她所幻想的）血亲父母欢愉的时刻；而对姜贵而言，这个真正的个人主体形成阶段不仅在四川，更在与母亲紧密连结时刻的四川³。简言之，「真实性」若无从依附于亲属体系——而此亲属体系恰好亦是当时国民政府正统反共论述中中共所极力破坏之「中华民族传统」之象征⁴——便

³ 梦，对当时许多中国流亡者而言为现世生活中几乎唯一可模拟性复制这「真正真实」的途径。紧随于《台南·潍水·巴山》一文之后的，便是姜贵于1969年所写对母亲之怀念——而这怀念之最亲密的感官性再现时刻便是在梦中：

身体，幸老而弥健。一天忙过，晚上洗澡之后，往床上一躺，照例一枕黄粱，不知东方之既白。

据说「至人无梦」，我距离这样的境界自然还远甚。不过我也不「多梦」、「乱梦」。我的梦，只有一个对象，那就是我的母亲。而今，「回忆」失落殆尽，留下来的只有我的母亲。 [下略]

即使是梦也好，难得看见了我所爱的人，我从她而来，我永远依偎在她的怀中，侍立在她的膝前。我虽满头白发，老态无可掩饰，但我在母亲面前，仿佛永远是孩子，天真烂漫，幼稚不能自主。（同上，页115；斜体处为本文作者所加）

⁴ 譬如，在姜贵的《重阳》中，国共之间的权力斗争相当性的以柳少樵及洪桐业二位男性之间的情欲争斗与互动来表达。国际共产组织于意识形态及革命行动上的感染性魅力，于此书中被理解为能于同时时间进行的多元言说行动网络中展演、并操弄论述异己主体位置之能力。书中中共的代言人柳少樵于以言说说服其欲吸收/征服的洪桐业失败之际，所完全征服对方的方式为直接肉体的S/M男男性交，这段文本值得全部引述下来：

柳少樵扔掉那香烟蒂，站起来，抱住洪桐业，在他的腮上嘴上连连亲着。

然后推开他，说：

「我们常常教训我们所爱的人。凡受我们教训的，一定是我们喜欢的人。我们把我们不爱的任何人，都看得像垃圾，不值一顾，他们不配接受我们的教训。你明白吗？」

「明白。」

「你愿意吗？」

「愿意。」[下略]

柳少樵嘴上笑笑，又问：「看见你腰上的刀吗？」洪桐业点点头。

「说呀，看见吗？」

「看见了。」

「它利不利？」

「利。」

「整把刀子插到你的腰里去，不费事吧？」

「不费事。」(下略)

彭文学把刀递给柳少樵，铺好油布，教洪桐叶立在油布中间，从柳少樵手里接过刀来，立在洪桐叶身后，刀尖从洪桐叶的背后对准他的心脏部位。一边说：

「兔儿，今天有你受的！」

柳少樵瞪他一眼，蓦地立起身，一言不发，就动手了。

.....
一时，事毕。彭文学放下屠刀，把滑到鼻尖上的近视眼镜推了上去，抹抹嘴上的汗，扶洪桐叶到柳少樵的床上将息。[下略]

柳少樵坐在床边上，俯身下去在洪桐叶的脸上吻着，用又短又硬的胡子在他的腮上摩擦，擦得洪桐叶又痛又痒，推他，他就俯得更紧，一迳并排做了下来。

「小洪，记住，我是爱你的。一切，一切，都由我爱你而起。」

柳少樵亲昵的说：「我永远见不得你背离我。一旦被我发觉了你背离我，我就取你的性命。即使取你的性命，我也在所不惜。你今天已经上了第一课，应该明白了吧？」(姜贵 1961：93-94)

洪桐叶受「教训」之表面原因在其「背信」于柳，在关键时刻未放弃其为法国买办服务的工作。这个「关键时刻」出现在为买办服务的其它中国工作人员邀请他去嫖罗宋妓女。为罗宋性交易者的女色而背离柳的指示，对柳而言显然较单纯的「违抗组织」更不能容忍，因此采取男男 S/M 的方式「教导」洪何谓「真正的爱」。但究其实，洪自为法国籍女主人修脚、因而酝酿对白种女性身体部位之情欲，至与罗宋妓女——亡国之「白俄女子」对中国被殖民男性的情欲想像空间中显然占有特殊的地位——进行买卖式性交，终至自愿式的成为柳的性奴隶（二人间这方面的情欲互动于此后仍不断被描摹），其情欲 / 权力的建构过程显然绝非仅涉及男 / 女、异性 / 同性之面向，尚应包括殖民 / 被殖民与国族 / 亡国的象征转换层面，而这个层面应该与「国际共产」 / 反国族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相关。

《重阳》中将国共斗争以如此的暴力性情欲关系描摹是相当值得进一步分析的，但囿于篇幅，本文仅再引述洪嫖妓完后的一段心态描述，以彰显前述情欲、权力、（被）殖民、及国家之间的关系：

「[前略]小洪，你喜欢看电影吗？」

「很少看。」

「范朋克总看过的，你喜欢他吗？听说他在月宫宝盒里边把一个拖辫子的中国人当狗熊耍，一定好玩的很，好戏不可不看。」(下略)

白俄男人见缠了半天，没有缠到一点生意，涨红了脖子，掬着毯子一气走了。嘴里嘟唧着，大约说的是俄语，也大约是骂人的话。

「亡国的人也真可怜，」张买办说，「男的卖毯子，领港，女的卖淫。」

「只怪他们从前享福太过了。」洪桐叶说。

荡然无存。

除了母性化的亲属结构之外，尚有其它表面上性别化的象征操作方式被再现主体用来或描摹其流亡的主体经验、或试图再现「台湾」这个虚空的时空脉络。于前引同文中，姜贵对其「第二故乡」台南的唯一描述为：

处处断井颓垣，暂时的破坏有待重建。但仍有许多空着的市房和住宅。行人带着木屐的清脆的声响，从容来去。这里没有汽车，脚踏车和三轮车也不多见。街上冷冷清清的，给人一种荒凉落寞之感。

这是一个村姑式的宁静而温柔的小城。

「宁静，宁静，懒人的初春似的宁静。」

「少女一样的清溪般的温柔。」（同上，页 109-110；底线为本文作者所加）

对「饱经忧患」的流亡者而言，台南唯有借助「如清溪般温柔的村姑/少女」这个叙事策略（trope）方能勉强再现。于此，重点倒非台湾/台南被女性化（或「村姑化」、「阶级化」、「乡村化」

旅馆门前的人行道上，一个穿红裙的英国军官，正挂着一个广东咸水妹悠然走过。那个咸水妹细细高高，黑黄皮肤，画着细长的眉，赤足穿着高跟鞋，有着一一种浓郁的南国情调。洪桐叶心里一动，觉得这和罗宋女人的肥白，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而实在各有千秋。（同上，页 48-49）

先透过直接的肉体接触（即性交），继而借由视觉的感官媒介，洪展开辨识国族差异性的能力，微妙的是，这个对其日后共产党员身分认同极具关键性的差异性最初竟须借由（性化的）女性这个媒介方能展现。小说中段起，柳为求训练洪「真正的爱」的能力，不断要求后者以汉人性/别及家庭意识形态之标准而言甚为极端之方式「奉献」其寡母及幼妹，如，诱二人成为性交易者。如前述，正统亲属结构不仅在国民政府论述系统中为标识其文化及政权正统性的最终指标，并可用来标识所谓无正统性的「匪伪政权」，对流亡者而言，亦是检验其飘渺的主体认同的最后一道防线。于此象征操作的过程中，母亲，如同文后将述及的其它特殊女性，更占有及特殊的地位。最后简略的提一下，对当时不分中外的《重阳》读者而言，其之所以被视为毋庸置疑的「反共小说」，也正因洪「混灭人性」「出卖母妹」的描述（见，如，Ross 1974）

⁵)，而是当「村姑」或「少女」与「温柔」及「宁静」等所指相连时，具有必要性的再现公认无法被再现的象征功用及效力——被公认本始必将失败的效力。⁶ 在本文接下来的部份，作者将借由「女匪干」这个特殊的例子进一步阐明前述之论证。

贰·无法被定义敌人·逃逸规范的女性身体

1951年9月21日至同年10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号召匪谍自首奖励检举匪谍办法摘要〉，于第三条中意图定义「匪谍」的认同辨识原则：

凡加入匪党组织或匪党外围组织，或已入伪民主同盟、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伪孙文主义同盟、伪救国会、伪农工民主党、伪民主救国会、伪民主促进会、伪三民主义同志会、伪致公党、伪民社党革新派、伪台湾民主革命同盟等附匪党派，或其他非法组织，或直接间接受共匪利用者，均得自首。（自立晚报 1951年10月7日）

这个辨识原则虽表面上务求明晰（其做法在逐例标示所谓「匪党组织或匪党外围组织」之各种可能之名称[proper name]），但其实同时也昭告了「匪谍」本质上的无从辨识性，而这个可怕的无从辨

⁵ 都市/乡村及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大同世界亦是常用以标识国/族阶级差异认同的叙事策略之一。此类叙事策略之功用不一，也就是说，其所指涉者并非绝然的中国/台湾这个二元对立元。如，本名郭俊雄的台籍作家陌上桑于描述第一人称男主角的「乡土」认同的短篇小说中，便以「真正的农村」这个意象展现台湾乡村的「中国性」：

——这条街很富有农村的色彩，小蕙说，一手伸进他的臂弯。

（中略）

——唔——这条街很富有东方情调。今年春假，鳗鱼走过这条街后就不绝地称赞它的纯朴；它是绝对属于中国的。临走他还一再强调着。（陌上桑 1968）

⁶ 当时常见的具有类似功能的叙事策略包括（台湾）下女、冰果室女郎、山地公主等等。宥于篇幅，便暂时不加讨论。

识性正指认了「匪谍」真正的认同。确实，当一物之身分唯有靠着无限延伸的转喻链（自「伪民主同盟」至「或其他非法组织」）方可展现时，这亦表明了不仅此链索上每一转喻均无单独存在之效力，且其唯一之功能仅在指向下一个转喻罢了。在这个象征生产过程之中，转喻链之起始（即「匪党组织或匪党外围组织」）与其终点（即「或其它非法组织」）互相复制，连续二者之间的「或」不断生产着居于其间所有的「伪」组织认同名称，但亦正因二者唯有借由这些认同名称相连方能勉强昭显其可能之指涉，这便也说明了「匪党组织」（及所有「伪组织」）无从被再现的能力。就极权政治操作的角度看来，也正因这无从被再现的「匪党」特质，使得基本上任何人及任何人群组织均可被轻易标志为「匪谍」或「匪党组织」——因而制造了无数无从感知现世时空的黄美之。「匪谍」前述之象征特色进一步表现于〈号召匪谍自首奖励检举匪谍办法摘要〉第四条条例中。此条申明基于第三条条例而被定义之「匪谍」应如何透过书写文字这个再现系统进一步标识自身之「匪谍性」：

自首者应具函说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学经历、住址、参加匪共组织之经过及时地，受匪利用或利用之详情，所知一切共匪人员之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今后志愿。（同上）

认同本质空虚之「匪谍」须不断自我标识，以「验证」其「真实性」。而自我验证（即「自首」这个政治仪式的真正目的）在国民政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操作过程中，被保证了「立除空虚性」的效力，而这个「立除空虚性」在论述系统中被立即转换为「重生」；「重生」指的不仅为象征与肉体二种生命的再度延续，亦暗示了「匪谍」生命（及认同）的虚幻性（或无生命性）。因此，在自首条例的第九条中说明了：

检举报告及自首书信，寄台北市台字二一五号信箱于新命先生（如属军人信寄台北市台字七一六信箱丁更生先生）。（同上；斜体处由本文作者所加）

「匪谍自首」必须经由书信而非「现身」的形式这个事实具有象征层次上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匪谍」为一内在空洞的认同能指，因此唯有借由不断自我延伸的转喻链方能勉强界分此身分认同的轮廓，而由于这个身分认同为极权政治体所霸权式地规范于社会个人之中，恍恍惚惚认同此界分之个人便须借助一再现系统来「填满」(fill out) 这空虚之能指。意愿进行此再现任务，自然表示主体已被意识形态召唤了。于此，「现身」并不重要之故应在个人物理性的身体（及于其上 / 中进行之身体与言说展演）无法保证及验证其认同的真实性，因为唯有透过另一本质虚幻的再现系统方能遮盖住 (cover up) 此真实性的虚妄。书信形式的必要性，更在其预先规范了收信的异己 (other) ——于此例中，为于新命及丁更生两位「先生」——因而创构了一种类似言说 / 论述行动中由对方 / 异己界定 / 裁决主体形成的情境。

During (1990: 142-3) 于分析十八世纪英国之写作形式一文中，建议以「市民想像秩序」(the civil imaginary) 一词取代「公领域」，此想像秩序之建立基础为市民写作，写作之形式包括书信、回忆录、游记、俱乐部记录、与地方史。这些书写超越了既存正统文学形式及国家主义之规范，形塑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空间（即其所定义之「市民想像空间」），其社会功能为重新界分社会中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进行之方式为生产及再生产有关仪态、品味、行止、言语等的再现以供市民于日常生活中仿效，因此其本质并非传统定义之「政治性」。更重要的是，During 认为重点并非这些再现形式是否「反应」了「真实」，而是书写于当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再现机制，使写作者借由再现以前所未有之方式与途径进入与重塑社会与社会性。我认为 During 这个看法对理解五零年代台湾公领域再现系统及其中之流亡主体之创构深具启发性。由本文之前对自述形态中主体与物的关系、时间—空间之建构等议题的分析可发现，书写——尤其是自知地对一想像之「大众」之书写——对当时之流亡者而言既是必要的自我再现的手段、又内孕极大之焦虑，在写与不写、及究

竟得 / 能写什么等考量之间,我认为一种新的再现主体正逐渐浮现。

在以文字再现为主宰的的五零年代公领域中,「匪谍」及其「同路人」对正统论述系统的自我复制因此具有必要性的存在价值。但不同于须自我演绎的自首匪谍,此处须尽力描摹其「匪谍性」。出现的情况为,如稍早论及,此特性往往并合了非正统汉人亲属与性 / 别体系所规范的特性(如姜贵《重阳》中描绘致力的男男 S/M 情境)。不仅如此,此特性——不论其表面指涉之性 / 别认同为何——通常以其「超逸规范性」、「过度泛滥性」、与「不可自抑性」加以展现。更重要的是,如稍早所申论,这些本质无法且无从再现的特性对于当时国民政府国 / 族正统论述之生产及合法性的确立具有必要的存在性。简言之,「匪谍」并非因身为「异己」(因而可借由其与「主体」间形成的差异性而被了解)而被再现;恰好相反,正因其必要的超逸再现系统之规范,本质虚幻的「差异性」方能被建构出来、并进而建构国 / 族认同主体。于以下所附典型之文本中,如同当时许多其它的「匪区报导」,作者的论述重点在强调「共匪」因附属苏俄共产国际之意识形态,故自失统治中国的国 / 族认同立场,而检验此论证之地点为深具中国现代史国家认同意义、918 事变发生之所在、满州国的首都沈阳。如同当时其它此类报导,作者强调资料来自「亲身经验者」⁷:

且说沈阳之内,有一所共匪之间谍学校,规模宏伟,深处「御花园」内,周围防禁森严,数里不许进,年来人但以以为园中存储军火,不许外泄而已,而未知其中正训练数及千人,各

⁷ 自白式的叙事于当时的公领域中被普遍使用,以「证明」叙事内容毋庸置疑的真实性。亦即,以象征之角度而言,「自白」之形式单向性的决定了其内容——而这也便是为何自今日的角度而言,绝大部份的此类自白同质性甚高,故而显得「无聊」之故。

自白同时以书写及身体展演的方式进行;譬如,所有的「反共义士」,包括大陈岛与一江山「难胞」,均需于公共空间中不断自白其「为匪迫害」及如何发现「共匪狰狞面目」之过程,其展演对象不仅为「全国同胞」,亦包括「前线战士」,因此,「反共义士劳军」便成为整个五零年代国家仪式 (state cults) 的重头戏之一。

国国籍均备之男女间谍，本文材料，来自过早派出潜伏内地，而为国军所捕获之该校学生俘虏所供认者，均可信其确切。（德苓 1951）

这个跨国共 / 间谍训练计画的主旨，如前所分析，在培育「超逸规范性」；于此，「超逸性」表现于主体不为既存社会分类制度（如阶级与国籍等）制约，可随时模拟周遭权力脉络中人与物之关系的能力；有趣的是，此超逸性于此与「过度泛滥性」、与「不可自抑性」并合，即，不可自抑者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拥有以及操弄商品的能力——也就是说，对此能力之自我约制被预设为国 / 族个人最基本的规约之一：

学生课程之中，即有一项为学习浪费奢侈之行为，求使学
生于将来工作上，能混迹于豪富者之前，而不露其寒贱冒
充之破绽，譬如吸烟，则举凡世界各种名牌香烟，烟丝烟
斗，打火机等烟具，无一不备，而指示其优劣判别，及使
用之场合及技术等，又如香水化妆，则举凡各国最上等之
香水，水瓶水球等，而无一不有，即早午夜应用何者，何
者应洒于身上某部份。（同上）

对物之规范界分之混乱，依据前述之人—物原则，必然性地导
向个人身体疆界与感官认知的混淆：

其中一项害人之法，乃为比杀人更残酷，而其人又生存，
毫无损伤者。其法为将对象人物，囚于一密室中，室中则
黑暗至全无光线，人在其中，始则黑无所见，久则眼球变
化，渐能觉物，继又能见物辨物，以至见物清楚。终而至
于能在室中读报时，则已毒害成功，其人出来，已不能见
物，非于黑暗中，便等于无眼矣。则室中尽属强烈之红色，
时常闪耀猛烈之红光，久之其人能凝睛注视裂闪红光而无
刺眼之感时，便可放出，其人乍睹红色外物，神经即错乱，
继发狂。（同上；底线为本文作者所加）

间谍训练终结于将受训者的肉身转化为可源源不绝释放性欲力
之机器，此机器之可怖处在于其必能转喻性地将与前述「超逸规范
性」、「过度泛滥性」、与「不可自抑性」等特质转移至与其交接

之(国/族)身体之上(或之中)。在现世之象征秩序中,可被指认、可认同异己之主体生命,如本文初始所论,必须依赖于多重包括时间及空间之界分区隔,如此方可生产正统、可被规训之身体;因此,在此身体于瞬间转化为字面化(literalize)这些「匪谍性」时,其象征生命便失去,因而必然性地便会面临其物理生命之消亡/被剥夺。这整个过程便是「匪谍」工作之精髓:

每一学生,均须受笑面杀人,愈残酷愈快乐之训练,通常以年轻貌美之男女死囚犯人,押一密室中,裸而缚之,缚至牢,或使男生对女犯人,将犯人身上任何毛发以最慢之速度,逐一扯拔脱下。或则持小刀,遂寸将之生生活剖。种种惨象,闻不忍闻,而被辈则须求其人之惨呼,流血挣扎等,愈惨烈而愈觉得快乐,所以如此,乃为「灭绝人性」始得不为情感所动之初步训练。

其中有一种,乃使男女学生,以最热情之性动作,对待被试验之人犯,于性动作最兴高采烈时,而以种种毒杀之手段施之,而绝无丝毫留恋。此举尤其特别施训于女间谍,自其指甲间所藏毒药仅凭热情之一夹,即能传毒于其人,而毒药之裂,其速有过氰化钾十倍者,其缓有延至十小时者,杀人于性举动中,诚异想天开也。(同上;底线为本文作者所加)

这篇报导于此嘎然而止。确实,如前所述,在本质虚空的流亡情境中,最后仅存可能意义之来源便是个人感官性之身体、以及与其产生模拟复制认同关系的理论上之意义能指载负者。因此,最可怖之情况,便是当「身体」这最后一道防线亦崩溃之时。国民政府所制造之政治冤狱,由黄美之的例子可知,其效力便在彻底地摧毁这防线;吊诡的是,此政治极权所极力再现之「共匪」/异己却又再现了极权运作之象征层面。当国府的流放政治体与前文中所描摹之「女匪谍」的性爱身体融合为一时,便正是五零年代市民想像空间奠基之期。

后记: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曾薰慧、孙蕙兰二位同学于1997年6月至9月期间与我共同搜集相关资料,并固定参与资料之分析讨论,对本研

究之论点发展贡献甚大，于此特别感谢二位之帮助。部份有关姜贵之资料由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同学吴复华提供，于此一并致谢。最后并感谢蔡柏贞在校对及文字润饰方面的协助。

参考文献

- 琦君，1980 <金盒子>，<湖天归梦>，<我的第一本书>，<校后记>。《琴心》。台北：尔雅出版社。
- 黄美之，1998 <我的红色塑胶番茄盒>。《不与红尘结怨》。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赵彦宁，1998 <看不见的权力：非生殖 / 非亲属性论述的认识论分析>。《新闻学研究》，第五十六集，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
- 姜贵，1957[1952] 《旋风》。台南。自费出版。
- ，1961 《重阳》。台北：作品出版社。
- ，1974[1962] <台南·潍水·巴山>。《无违集》。台北：幼狮文艺社。
- ，1974[1969] <梦里慈晖>。《无违集》。
- 焦一枝，1950 <我在台北——开笔大吉>。《自立晚报》，八月十六日。自立晚报
- ，1951 《奖号召匪谍自首奖励检举匪谍办法摘要》。第一版。十月七日。
- Ross, T. 着，陈森译，1974 <论姜贵小说的主题>。《书评书目》，14 期。
- 陌上桑，1968 <沧桑之后>。《台湾日报》，副刊，十一月二十四日。
- 德苓，1951 <沈阳间谍学校训练「性动作」杀人>。《自立晚报》，<万家灯火>，九月二十四日。
- Alho, O. 1987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 Almqvist, S. O Cathain, and P. O Heilai (eds.), *The Heroic Process: Form, Function and Fantasy in Folk Epic*. Dublin: The Glendale Press.
-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Monthly Book Review.
- Appadurai, A. 1991 “Global Ethnospaces: Notes and Queries for a Transnational Anthropology.” In R. G Fox (ed.),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191-210*.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 Balibar, E. & I. Wallerstein 1991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New York: Verso.
- Bergson, H. 1988 *Matter and Memory*. New York: Zone Books.
- Bhabha, H. 1990 *Nation and Nar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Chow, R. 1995 *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leuze, G. 1989 *Cinema 2: The Time-Image*.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uring, S. 1990 "Literature—Nationalism's Other? The Case for Revision." In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42-143.
- Freud, S. 1963[1929] "Fetishism." In P. Reiff (ed.), *Sexuality and the Psychology of Love*. New York: Macmillan.
- Gilroy, P. 1991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and 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vinas, E. 1989 "The Servant and her Master." In *The Levinas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 150-159.
- Libertson, J. 1982 *Proximity, Levinas, Blanchot, Bataille and Communicati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Malkki, L. H. 1992 "National Geographic: Rooting of Peoples and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Scholars and Refugees." *Cultural Anthropology* 7(1): 24-44.
- 1995 *Purity and Exile: Violence, Memory, and National Cosmology among Hutu Refugees in Tanzania*.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urner, V. 1967 *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Van Gennep, A. 1960 *The Rites of Passag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